

文章编号: 1673-1646(2016)03-0001-08

# 从生态伦理视角看《黑暗的心》

查日新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本文以生态伦理视角来审视康拉德《黑暗的心》中非洲的“原始”对欧洲“文明”的扰动, 以及探讨非洲因素如何在强加的殖民空间中坚持自己的言说来还原所谓的地理想象。原始非洲构成的生态共同体表现出生态伦理的正义性, 以自己的方式迫使殖民空间产生崩裂, 发生变形。而西方殖民征服对待土著和非洲大陆的态度和行为里却是生态伦理关怀的缺失, 破坏的是生态共同体本身拥有的目的和秩序, 导致西方的“空洞化”; 背后的殖民话语浸透着谎言和权力的毒素, 派生出的“黑暗”力量既给土著黑人带来奴役和死亡, 也让殖民者在本体意义上堕落和死亡。

**关键词:** 《黑暗的心》; 生态伦理; 地理想象; 原始; 殖民空间; 死亡

**中图分类号:** I56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6.03.001

## Interpretation of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Ethics

ZHA Ri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s to be studi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ethics so as to investigate how African primitiveness as an integrate ecological entity disturbed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how Africa guarded its discursive space in the shadow of dominant colonial space, thus exposing the fallacy of the European geological imagination about Africa. With all its primitiveness, Africa possessed the justifiability endowed by eco-ethics on the basis of eco-community, which forced colonial space to fall apart. In contrast, eco-ethical concern was absent in colonialism which destroyed the purpose and order embedded in Africa's eco-unity and consequently led Euro-colonialism into "hollowness". As contaminated by lies and power, dark forces derived from colonialism not only brought about slavery and death to native inhabitants, but also caused degradation and death to colonialists in the metaphysical sense.

**Key words:** *Heart of Darkness*; eco-ethics; geo-imagination; primitiveness; colonial space; death

### 0 引言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自问世以来就是学界关注的话题, 但关于这部小说的争论也从未停歇。这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该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意涵, 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批评视角下做出不同的解读。本文拟通过生态伦理的视角来审视非洲的“原始”对欧洲“文明”的揭露与证伪, 在强加的殖民

空间中坚持自己的言说, 在死亡中把持住生命。而殖民者却虽生犹死, 在“胜利”中死亡、腐烂。土著的生命与身后的山川、河流、草木、动物是一个整体, 自然的和谐、健康也体现在土著的身体上, 因为他们彼此关联、相互合谐共存, 他们存在的逻辑是坚实的、恒久的, 他们构成的是一个土地和生命的共同体, 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有自己存在的秩序。而白人殖民者秉承西方文化的传统, 把自己从

\* 收稿日期: 2015-12-08

作者简介: 查日新(1962—), 男, 教授, 从事专业: 英美文学与西方文化批评理论。

自然中抽离出去,与自然呈现分离、对立状态,因而变得空壳化,虚弱不堪。康拉德所谓的“空心人”就是这样造成的。殖民者在给非洲带来死亡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死亡。表面上看,西方构筑了一个体系化的殖民空间,并主宰着这个空间,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真实的状况是殖民空间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固定的空间。相反,作为被征服对象的非洲的土地、土著原本拥有的原始的、传统的非洲因素仍然不会被消灭,这些因素代表着一种非洲的尊严和力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迫使殖民空间产生裂隙,发生变形,出现的结果对西方和非洲具有双重但不同的意义:西方殖民征服表面上获胜了,但原始非洲本质上没有失败,反而导演了具有深刻哲理意义的逆转——“胜利者”变成失败者,“失败者”变成胜利者。

## 1 西方对非洲大陆的地理想象:反生态的悖谬

在西方殖民者前往非洲大陆之前,他们对非洲已经有了固定的预设观念。这种观念不是依据于事实,而是依据于想象。结果,想象制造出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非洲,并形成西方视角下的非洲形象。由于非洲大陆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一直被标记为蛮荒、原始,笼罩在太初般的混沌之中,因此,可以说西方的想象是从地理想象开始的,进而扩展到土地上的存在物,包括土著及他们的文明样态。西方通过预设的立场和观念,如对殖民地的地理的想象(描述或绘图),对当地人的描述、分类,生产出了关于非洲的一整套“知识”。这些可以称之为“权力制度(Institutions of power)的东西”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在其统治下人类的性质、领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stry)的正当性”<sup>[1]159</sup>。结果,原本应该是事实性的地理描述经过地理想象偏离了客观的立场,成为服务于西方殖民征服的地理语境下的政治修辞。

那么,西方之地理想象的依据是什么呢?小说中搭乘船长马洛的蒸汽船前往非洲大陆腹地(被白人视为“黑暗的中心”)的白人殖民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作“朝圣者”。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朝圣者”往往强调特定人群的宗教立场、使命感、上帝的选民身份,他们到一个化外之地去践行上帝赋予的使命,把“福音、文明、进步、科学、教化”带给“黑暗”之地。“朝圣者”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和自信呢?源头要追溯到《圣经》在“朝圣者”们

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自以为前往一块陌生的土地是为了履行“人神契约”赋予的使命;在基督教自然观的影响下对土地及土地上的存在物进行区划定位;通过预设的观念在实践中进行自利性的区隔,把原本是自然的地理状态附着上了价值判断,进而通过对土地的否定延伸到对土地上的存在物的否定,特别是对土著黑人的否定。换句话讲,西方对非洲的地理想象是一种思想文化行为,旨在通过构建一种话语体系,设定一个等级秩序,为自己进行合法性授权。

“朝圣者”这个称谓可用来作为一个线索去进一步探究西方对非洲(非西方世界)的地理想象。“朝圣者”给出的关联意义是这些人来自基督教世界,他们负有神圣的“使命”,他们受命对蛮荒、未开化的土地实行统治。这种统治被当作是一种“仁慈”,而为此目的使用的强权、暴力不过是为了一个更高尚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手段。“朝圣者”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造物(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出来的),因而享有统治他物的权力,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明确写着上帝的意旨:“你们”要“治理”“管理”万事万物。而且,在大洪水之后的第九章第2节~第3节,上帝再一次发出同样的神谕:“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爬虫和水中的各种游鱼,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这一切都已交在你们手中……我已把这一切赐给你们。”考虑到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强大的心智塑造力量,那么这种“托管”是什么性质呢?针对“托管理论”,基督教思想史上就有争论,有观点认为是仁慈的托付,然而许多现当代文化批评学者认为《圣经》强化了人类中心思想,这从希伯来文中的“治理”(Radah)和“管理”(Kabash)两个词就可见一斑。“在整个旧约中,Kabash和Radah被用来表明某种武力攻击或击碎的行为。其意象是:一个征服者把脚踏在被打败了的敌人的脖子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sup>[2]108</sup>《黑暗的心》作为一部小说典型地昭示了西方地理想象图景形成的原因。“朝圣者”们显然遵循着《圣经》设定的思维模式,把非洲的荒野排除在伦理关怀之外。对此,众多生态思想家在这方面多有共识,正如纳什所言:“基督徒认为,对蛮荒的乡村及野蛮的居住者的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统治和征服……”<sup>[2]110</sup>

出自《圣经》的神谕或圣言在西方思想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往往被当作诠释事物的根据或本源。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洲大陆的地理

想象采用的是符合论的思路,也就是说,西方世界首先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并围绕这个立场去找寻依据,用一套所谓的说辞和论点来证明这种先入为主的、自利的东西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原本只是文字的表达被当作是真实状况的描述,甚或是当作真理;原本是没有实证基础的想象,却被当作是现实,取代了真正的现实。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解释,出于需要而不是倚据事实构筑成的观念并把自己置于中心统治地位,就是人造的逻各斯式的产物,而成为逻各斯的观念非同一般,它有如历史上的圣言或神喻,被认为彰显事物的本质和本源;它塑造人们的心智图式和行为范式,使某个观念成为顽固的思想并与其它类似的观念一起构成体系化的话语,无论这些观念涉及哪些范畴,其基本特征都是等级式的、压迫性的。如:二元思维下的西方与东方、文明与原始、男性与女性、在场与不在场等。每一个范畴里都包含一种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美国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指出西方文化与自然为敌的意识形态传统:“艺术和文学、伦理学和宗教、法律和民俗,都依然要么把土地上野生的东西看作敌人,要么是食物……这种土地观是我们从亚伯拉罕时就固有的。”<sup>[3]216</sup>命名对方为“敌人”之目的是为己方获取合法性,并建立一个免除自己道德责任的行动逻辑。

生态批评学者认为《圣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看自己、看他人、看自然的方式。白人殖民者对待大地的态度恰恰是如此,他们站到大地和土著的对立面,视之为“敌人”或“资源仓库”。土地、物产被按其经济价值评估,并按一个科学设定的计划开发利用。小说中,库尔兹受到其他白人殖民者的热议或忌妒,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搞到的象牙比其他人的加在一起还多。库尔兹在非洲大陆腹地建立起贸易站,科学成了暴力和邪恶的倍增器。科学技术本应该带来文明与进步,但由于拥有者目的的偏离,科学技术成了助纣为虐的魔鬼。

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是此类地理想象的一个重要源头。按通行的看法,除基督教外,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希腊精神。在论及人在宇宙中的定位时,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念并非普氏独有,而是整个希腊精神对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定位,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弥足深远,从中既派生出了积极的人本主义思想,也为人类中心思想奠定了基础。就后者而论,人类中心论在西方文化思想史

上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特别是近代以降,由于笛卡尔、培根思想的影响,西方之自然观形成了一种固化模式:以自然为对手,以土地及土地上的存在物为资源仓库;它们存在的价值除了服务于人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别的价值。“培根宣传其新的经验方法不仅是热情地,而且时常带有露骨的邪恶。根据他的观点,自然应当成为‘奴婢’,应当受到审讯,科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严刑拷打逼迫自然说出她的秘密。”<sup>[4]42</sup>而且,在殖民者眼中,土著黑人也是被当作没有高贵理性、语言的物来看待的,他们的作用在于他们的筋肉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有了这种定位,西方殖民者给予了自己合法性授权,并试图免除使用暴力引起的道德责任,因为物是没有主体性的,是可以随意处置的。

地理想象构建好一个西方语境下的地理空间,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空间用作殖民活动的场所。面对蛮荒、黑暗、未开化的非洲大陆,殖民者把自己想象为“文明、进步的使者”,要作为“指路明灯”来照亮“黑暗”腹地的非洲大陆。这是地理想象的延伸,里面包含着此种地理想象的目的。既然这片土地如太初般蛮荒,那它就一定需要拯救者。谁才是拯救者呢?当然不可能是来自“黑暗”大陆的内部,而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使者。

所以,当出于自利立场的地理想象遮蔽了真相时,除了马洛,很少有人去质疑真实和不真实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把想象的非洲当作了真实的非洲。唯其如此,他们才能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不是他们不能去发现真相,而是主观上不愿意去发现其中的谬误。当然这不仅是观念上的问题,因为清算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之后,就意味着要改变对待非西方世界的立场,就意味着要改变殖民者在非洲大陆暴力掠夺的行为。因此,殖民者为了利益的考虑,宁愿相信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愿去探究背后隐藏的真相。可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把良知出卖给黑暗力量的行为,旨在交换到作恶的便利,并在其中隐藏了殖民者真正的神主:征服、开发、利润。在这种情形下,发现和讲出真相需要良知和勇气。此处的良知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东西,而是涉及人的本真性、自我面目的问题。马洛船长在小说中是唯一思考真实与不真实这个问题的人。在从刚果河深入非洲大陆的行程中,马洛的所见所闻、遭遇的各种事情迫使他去寻找一个答案,即便这个答案是痛苦的、可怕的。马洛在所有的白人中间显得孤独而另类,他不再相信欧洲预先准备好的答案,他

害怕被其中的谎言污染。而其他的殖民者早已把灵魂和肉体交了出去。他们自以为是交给了上帝,但实际上是交给了谎言和贪婪。“‘象牙’这个词儿在空气中震响,在耳根边传诵,从嘴唇边叹出。你会以为他们都在那儿向象牙祷告。”<sup>[5]513</sup>马洛则抛开了偏见和自利的立场去观察,因此他能听到荒野的声音,能洞察其他的殖民者残暴而又怯懦、不可一世却又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以深刻的疑惑问道:“那些树木都耐心地从身后观望着来自另一世界的涂满污泥的破铁片,这变革、征服、贸易、屠杀和福音的先驱。”<sup>[5]583</sup>

## 2 生态伦理下强与弱的辩证转换:实存与虚空

在西方的视角下,非洲的原始是一种“无”的状态——西方标准下文明社会的要素在非洲都是缺失的,如果要给出什么定义的话,那只能是否定的。但在生态伦理的视角下,原始的非洲处于丰富的“有”的状态,“有”就表示有实际存在的内容和依据,表现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状态,而自诩为文明的欧洲则处于极度的“无”的状态,即失去了根本性的依据,表现为本质上的否定和状态上的“虚空”。具体表现为把“福音、文明、进步、教化”用作托辞,把科学用作征服的工具,真实与表面信仰的分裂导致“空心人”及相关的一切被虚化。

西方在施行对非洲单方面的、强行的定义时并没有把非洲当作一个对话的对象。然而,单方面的无视并不能否认对话的发生。非洲的原始状态即是一个对话西方文明的言说者:沉默但不缺席,以本身的存在实在性和理据去揭露西方殖民话语的虚假说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揭露其宣称的目的和实际目的的背离。而且,西方殖民话语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它必须制造出更多的谎言。宛若致病的细菌,叠加的谎言让躯体患病、腐烂直致死亡。马洛要去寻找的库尔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高举“文明”的旗帜,却杀人越货,攫取象牙,在不断作恶的过程中积聚起自我毁灭的因素,最终杀死了自己。

西方殖民者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建立在否定对方的基础之上的:剥夺自然和土著的主体性,把对方当作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无需顾及伦理和道义。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设定西方中心的立场,依据若干想象(地理想象、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授权。他们以“统治-被统治”的二

元思维定式为出发点,迷信征服者的权力,完全无视被征服对象可能拥有的力量,结果被这种力量打败。只有马洛意识到西方文明里的“空洞”,其他殖民者套着仅是外壳的甲冑在非洲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谬和无力,眼中只看到掠夺、杀戮所获得的具体战利品,却看不到己方招至的个体意义上的失败。结果就是力量的转化和胜败的翻转,虽然殖民者看似达到了他们的一个个目标——攫取象牙、贵金属、奴役土著,在他们得意于自己的武力的同时,他们没想到由武力征服派生出的自我否定的结果。同时,二元对立思维使殖民者只看到一个观念上预设的“他者”——等待被文明征服、拯救,不愿看见,也不愿承认“他者”的力量。殖民者把自然界看作是丛林世界,遵循“强权既公理”的法则。这个所谓的信条是西方思维对自然界运行机制的歪曲,它片面、自利,其中没有共存的概念。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强权者”只看到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成果,如象牙、贵金属和抓来做苦工的土著黑人,但看不到他们与非洲的土地、山川、河流、草木构成的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孕育生命,维护稳定、和谐、健康的生态共同体。因此,殖民者与之之为敌的不只是具体的种种人和物,而是一个伟岸的整体。在碾压弱者的同时,他们也破坏了自然界的最高法则,既和谐与共存的法则,不仅排除了对“非我族类”的伦理关怀,也排除了对自然的伦理关怀。所以,这里透露出殖民者的短视和愚蠢,他们纵容恶,但又为恶行罩上美丽的谎言。暴力和谎言都是恶。他们用一个恶去掩盖另一个恶,并无力清算自己制造出来的恶,在不断制造恶的过程中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西方对非洲的予取予夺完全是单边的,对土地、对土著的立场表现为彻底的权力关系。库尔兹等一干殖民者,作为帝国的“代理人”,都与公司签有工作合同。除此之外,他们还与整个西方世界签有“协议”:传播西方的“福音、文明、进步、教化”来照亮“蛮荒、原始、黑暗的”非洲大陆。该“协议”时常挂在他们嘴上,谓之“使命”,为之服务可以获得崇高的荣誉。但仅仅是荣誉就能换取殖民者们的奉献吗?不行的,这种宏大的、非现实的回报是不能换取“朝圣者”的忠诚的。“福音、文明、进步、教化”仅仅是一些堂皇的说辞而已,难以达到有效的人力动员,让库尔兹之类的人远涉重洋前往陌生的大陆深处是另有所求的。殖民者需要的是实际的、物质的回报。因此,这里有意义的是前往非洲的殖

民者与各自雇主、公司的合同。仔细看一看,合同的标的是什么?是非洲的象牙、贵金属等物资。执行合同的手段是什么?是欺骗、武力、掠夺、杀戮。“在这一伙人中间没有一星半点远见卓识或者是严肃认真的打算……把金银财宝从这片土地的地壳下挖出来就是他们的意愿,这种意愿的背后所具有的道义目标,并不比溜门贼撬开一只保险箱时更多些。”<sup>[5]525</sup>这种行径在小说中随处发生、随时发生,已完全脱离了任何正常贸易的范畴。贸易基本上要遵循一些规则,在符合法律、道德的框架下行事。但在非洲,这一切都可以弃之不顾。契约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只有巧取豪夺。白人殖民者只与欧洲有“合同”——大的叫“使命”,小的叫“工作”,非洲则被装入合同而成为标的。可以说,设在欧洲的公司和派往非洲的殖民者一起干的是强盗的勾当,两者之间的合同遵循的是强盗的逻辑,既强盗团伙(公司)与强盗(殖民者)按工作成效(掠夺的物资)以一定的比例坐地分赃。这样一种分赃的诱获才是殖民者们前赴后继前往海外开疆拓土的动力,是匪帮与匪众之间的魔鬼之约,匪首要的是财物,至于是不是带血的财物那就不管了。匪众则依赖公司的资本、组织能力、工具(轮船、火车、炸药、枪炮)去敛财。公司用来评价这些前往非洲的“文明使者”的标准都是一些量化标准,可以用数量或重量的单位标识出来。作为殖民征服对象的非洲被转换成各种数字、图表和地图上的标记。自 16 世纪以来,伦敦的泰晤士河口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满载而归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们和他们率领的船队,有时女王还要“亲临拜访”,而后封这些帝国的骄傲(黄金的猎取者或荣誉的追逐者们)以贵族头衔,原因是“圆滚滚的两侧船舱中装满金银财宝”<sup>[5]485</sup>。同理,引起众人崇拜或嫉妒的库尔兹在于他一个人搞到的象牙比所有人加在一起的还多。而传播“文明、进步、教化”的使命在任务评估中是不见踪迹的。所谓的传播“文明、进步、教化”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在实践中,舞动遮羞布最成功的人也是掠夺财富最多的强盗,如库尔兹。两者的矛盾作用使库尔兹成了人格最分裂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对着象牙祈祷,但却要装向上帝祈祷,持续的谎言和作恶日渐消解他的灵魂和肉体,最后在临死前成为一具轻飘飘的空皮囊。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非洲的力量还在于反向利用殖民者的虚伪和残暴,在与殖民暴力的交织缠斗中,迫使殖民主义内部分解出自我否定的因素,让原本加害他人的力量成为一把双刃剑,使加害者现

行,乃至毁灭。所以,非洲大陆的力量与西方殖民强权的角力具有哲学的辩证意义:征服者走向的是失败,打开的是通向地狱之门。而被征服者表面上看是节节败退,但内在的生命和力量使之最终胜出。非洲大陆上所有形式的存在物保持着与自然的纽带关系,他们完整、坚韧、健康。小说中的这种情景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生态思想者列奥波德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定义:“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sup>[3]213</sup>即它必须是整体的、共存的空间,而不是割裂的、相互敌对的。归结到一点,视土地和土地上的存在物为“敌人”和“食物”的立场是取祸之道,因为远近的历史殷鉴皆表明“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征服最终只是招致本身的失败”<sup>[3]194</sup>。

西方殖民话语出现了虚饰与真实的对立,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想象的非西方世界与真实的非西方世界;虚化的西方世界与真实的非洲大陆;这种对立显示出西方的“空洞化”——自欺、暴力、征服、毁灭与非洲生态共同体的完整、和谐、健康。

小说中一个白人殖民者始终端着“文明人”的派头,穿着体面,“高雅精制”,让人“猛一看以为他是个什么幻影”<sup>[5]505</sup>。他的同类不在少数,都适用下面的比喻性描述,在光鲜的外表下,没有“五脏六腑”,连那只汽船也“好象一只水中大兽的尸体”<sup>[5]518</sup>。这些文字暗示这帮人是一群反自然的存在,与自然状态的实存、真实相比,他们不过是“幻影”。表面上,这是康拉德写下的文字,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是马洛读懂了非洲大陆和土著在哑默中的言说,把文明和原始两相比较获得的一种领悟。装腔作势的殖民者们不屑于把土著看作人类,但马洛却从土著黑人的“跳跃”“嚎叫”中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亲缘感”,感受到黑人擂响的鼓声的节拍与自己的心跳合拍。殖民者的傲慢来自于他们预设的立场,从根本上否认非洲的原始状态还拥有力量和尊严,意识不到来自原始的反击。

殖民者把自己从自然环境抽离出来,与山川、河流、草木、土地、土著为敌。这既是殖民者的傲慢无知,也是他们在非洲的土地上表现得如此孱弱的原因——在道义上,同时也在本体意义上斩断了灵魂和生命的滋养来源。由于内在的空洞,他们只能依靠强权维持一种脆弱的征服。而对面的所谓“敌人”则彼此关联、相互和谐共存,他们存在的逻辑是坚实的、恒久的,他们构成的是一个土地和生

命的共同体。

自然及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本身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有自己存在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一切形式的生命是和谐而健康的。但闯入的殖民者却要打破这种秩序,试图建立起一个服务于他们利益的秩序。无论强势一方多么霸道,它都不能抹去对方的存在,而且还要遭到对方的扰动、揭露;即便强势者不以被征服者为对话的对象,但对方的原始始终是西方文明的观察者和评判者。这是武力和强权无法消灭的对手,因为存在了的东西必然是空间的存在。文化空间的特性就是你可以对弱势一方视而不见,但无法把对方的空间存在消灭。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建立殖民空间的过程中,非洲原本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被消灭掉的,它窥视着任何一个机会对闯入者进行反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弱者也是有力量。表面上,原始的非洲在西方的侵入下节节败退,但在原始庄严、肃穆的哑默中,殖民者的“胜利”显得荒唐可笑,也籍此昭告天下: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不是鬼魅般的殖民者。

### 3 生态伦理的终极意义:死亡与超越死亡

泰晤士河口也曾是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场所。这里“也是世界上的黑暗地带之一啊”。后来随着罗马人的到来,“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sup>[5]487</sup>按通行说法,罗马文明曾是欧洲的一盏“明灯”,罗马人的征服驱散了英伦之地的“黑暗”,使蛮荒之地步入文明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欧洲经历工业革命的激荡,其力量已今非昔比,但西方也经历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思想文化意识的演化。培根、笛卡尔的学说承继二元论思维范式,奠定了现代理性的基础,把一切纳入一个“主/客”“主/从”“支配/被支配”的等级结构中,所谓的“文明、科学、进步”等概念是有预设归属的,无疑,它们是属于欧洲的。拥有“文明、科学、进步”的欧洲当然就是“中心”。“中心”不只是一个词汇,更是一个权力的概念,围绕这个“中心”西方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又顽固的话语体系。话语、经济、殖民、武力征服,说到底,都是权力,构成了一个权力共同体。如果做一下分类,这些形形色色的权力范畴不一、属性不一,但就英国而言,它们都在帝国话语下被一体化了。观念的、思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属于话语权力,做的工作是对自己进行合法性授权,并让实质性的科学、经

济力量服膺于话语权力的支配,如技术、先进工具、枪炮、市场、开发、利润。就这样,近代欧洲就在这些复杂的权力机制的驱使下到处横冲直撞,以各种伎俩干着各种勾当,攫取利益,但同时,运用这些权力的人自己也受制于权力,在奴役他人的同时也奴役着自己,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着自己。所以应该看到,小说中描述的库尔兹、“朝圣者”们一类的殖民者是具体的作恶者,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造就邪恶的权力共同体。

邪恶是黑暗的力量,所以,当西方得意于自己的“光明”,并想成为别人的“指路明灯”时,它自己却置身于黑暗之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残忍而又虚弱。尼采对西方世界里生命的衰微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即他称之为“奴隶道德”的东西捆绑了人,让人放弃诚实而选择谎言,屈从权力而放弃自我。“奴隶道德正是生命衰败的肇事者。”<sup>[6]2</sup>当真理匍伏在实利主义脚下后,结果自然不言而喻:“真理总是被污染,被权力和欲望所污染……真理总是和利益相结合,它是利益的托词、借口。”<sup>[7]5</sup>在《黑暗的心》中,“黑暗”应该与真理关联在一起来理解:当谎言僭越真理成为信仰,真理便被遮蔽,隐身在黑暗之中。但真理不会消失,它会在某个时点,借助某个触媒,发出震撼的一击,让僭越者在明光的敞亮下显露原形。孰为“黑暗”便昭然若揭——来自“文明世界”的是黑暗的力量:“他们是征服者,而要当个征服者你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为了获得所能获得的东西,凡是可以到手的,他们都去摄取。”<sup>[5]488</sup>而原始则是本真、无污染、不需要任何修饰的。非洲的原始以其不可摧毁的庄严和生命的意志对自诩为真理裁定者的西方文明作了颠覆,虚饰和谎言使西方的良知败坏、分裂,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却要死死坚持对谎言的道德美化,并自我欺骗地相信自己在履行神圣的契约,在完成欧洲托付的“任务”。

库尔兹被当作欧洲“事业”的先锋,“他是一位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sup>[5]517</sup>。一个库尔兹的崇拜者大谈“我们”在非洲的崇高目标。一边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库尔兹同类,一边是非洲的土地、森林,马洛感到面对的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魔鬼:“这个纸糊的魔菲斯特,我似乎觉得,假如我试一试的话,我伸出一根食指就能戳他一个洞,而在他的肚皮里除了屎尿之外,或许什么也找不见。”<sup>[5]518</sup>这是夸张的玩笑吗?不是的,康拉德是严肃的。在其它场合,他

还使用过这样的文字来暗示白人殖民者没有“内脏”，唯其没有五脏六腑成为“空心人”才能在非洲从事好欧洲托付的“事业”。与之相对，马洛的眼前是“这片土地上的寂静沁入你的心脾——它的神秘，它的伟大，它隐蔽的生活中所包藏的令人惊异的真实”；“我的鼻孔里，天哪！满是泥土的气息，原始泥土的气息，我的眼前是原始森林的崇高的静穆”<sup>[5]518</sup>。泥土的气息、野草、森林与白人殖民者两相对照，马洛感受到了前者的真实，也感受到了后者的虚饰，非常害怕自己被谎言俘掳，因为“谎言里带有一种死亡的腐朽味儿，一种致人死命的臭气”<sup>[5]519</sup>。谎言用来遮蔽、扭曲、否定真实，阻止人们去发见真理。真理一词(Aletheia)的希腊词源的解释是“敞亮”，意指原本包裹在黑暗中的事物显现出来，而谎言描述的是“伪事实”，维护的是“伪真理”，会遮蔽真理之光，因此谎言是“黑暗”的同盟；它的存在不是依据于真实，没有“实存”作基础，因此谎言的所指是“存在”的反面——“虚空”，亦可以说是“不存在”。所以，谎言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自欺欺人的殖民话语，白人殖民者对谎言没有批判，没有清算，相反却出于自利的目的竭力去维护这个谎言体系。谎言是假的，目的是为了私利去扭曲现实，结果是身体因为服务于谎言而被掏空。因此，谎言是黑暗的力量，它遮蔽人、扭曲人、否定人，并使人堕入信念的悖谬之中。

库尔兹受到非洲土著的顶礼膜拜，被奉为神明。弗洛伊德在研究神话与集体无意识时曾提出一种推论，即人们心理普遍认同、崇拜的美好、善良事物的原型多可对应到神话当中的某个邪恶的形象，比如主宰命运的死亡女神因其狰狞可怖，象征在劫难逃而令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死亡女神摇身一变成为美之女神就成了人们接受的对象，不仅被赞美，而且受到膜拜，完全掩藏了其邪恶的面目。库尔兹深知自己的内心是魔鬼，但以天使的面目被土著奉若神明。土著越崇拜他，他越是分裂。在掠夺财富、奴役土著和骗取土著膜拜的过程中，库尔兹必须依赖谎言，一是对自己重复或复制欧洲殖民话语固化的标准谎言——曰自欺；二是运用自己在文明社会学到的知识和手段骗取土著的信任——曰欺人。无论自欺，还是欺人，谎言就是谎言。结果是谎言消解了西方的真实性，一步步掏空其存在的基础。小说中，康拉德描写库尔兹濒死时身体几乎飘飘地没有一点重量，看似不可能、超现实的描写显然不能从表面上来理解，而应从象征的角度来理

解其喻意，既库尔兹把自己交付给了谎言，他的殖民掠夺越成功，他就越深陷于谎言。同时，他也要为谎言付出代价，在失去自己本质的、实在性的东西后走向死亡。

西方殖民者的死亡与非洲土著的死亡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土著的死亡是肉体的，生物体的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是在外力的作用下死于疾病和屠杀。“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盘起腿坐着两把瘦棱棱的黑骨头。其中一个把下巴撑在膝盖上，视而不见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同在的另一个幽灵则是前额伏在膝盖上。仿佛被一种极度的困倦所压倒；四周散开的其他人，有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恰象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sup>[5]505</sup>。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抓来做苦役的黑人被榨干了筋肉扔在一边等死的场景。然而，白人的死亡不仅是肉体的，也不是个体的，而是本体意义上的、类属的，如奉行“文明、进步、教化”之托辞行掠夺、杀伐之实的殖民者们。这些因素付诸于实践就是制造死亡。制造死亡就是对人性、对自然伦理的违背，因此引导人们投身“死亡游戏”的文化信念本身就是死亡，投身其中的人皆在本体意义上“死亡”。可怕之处是，在无反思、无批判状态下，孕育白人殖民者的思想文化信念还会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象“朝圣者”一类虽生犹死的活死人。马洛回想起布鲁塞尔工司总部象一座“白色的坟墓”，坐在办公室门口织毛线的两个女人，“她们守卫着那黑暗世界的大门，她们结的黑绒线好象是用来做一条温暖的遮尸布”<sup>[5]494</sup>。马洛预见他“即将去结识的，是一个软弱无力、装腔作势而又目光短浅的贪婪和残忍得愚蠢的魔鬼”<sup>[5]503</sup>。到了非洲，马洛看到象征西方力量的锅炉、火车、铁轨、机器翻倒在草丛中生锈，腐烂，“看起来像一只动物的尸体样死在那里一动不动”<sup>[5]501</sup>。死于枪炮、疾病、苦役的土著是具体的个体，其死亡并不能超越个体而成为族群死亡的象征。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自然的生命，厄运也不能斩断他们与自然的纽带。只要自然是完整的、坚实的、健康的，就会不断孕育出同样的生命。只要在白人殖民者的魔爪之外，只要回到自然的怀抱，土著黑人就又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大地之子。一群划桨的黑人“呼叫、歌唱；他们汗如雨下；……但他们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象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他们出现在那里无须任何借口。”<sup>[5]499</sup>两相对照，笔者认

为自然代表着滋生、养育生命的友善关怀的力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貌似“文明、进步”实则却是扼杀生命的黑暗力量。

#### 4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以生态伦理视角来审视非洲的“原始”对欧洲“文明”的扰动,对强行闯入的殖民话语坚持自己的言说,原始非洲构成的生态共同体表现出生态伦理的正义性,而西方世界对待土著和非洲大陆的态度和行为里却找不到任何生态伦理关怀的痕迹——他所拥有的目的和手段不是为了维护而是破坏了生态共同体的完整、和谐、健康。西方的“空洞化”首先表现为生态伦理关怀的缺失,加上谎言僭越真理成为主导性力量,带来的是奴役、疾病、死亡;破坏的是自然本身拥有的目的和秩序。自欺和欺人产生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内生式的否定;欧洲的殖民话语浸染着权力的毒素,为权力服务;单方面地对非洲进行描述、定义,罔顾制造出的非洲与真实非洲的背离。在殖民话语之外,非洲的自我呈现是一体的、统一的、真实的,在死亡中把持住生命的不屈和尊严,拥有生态伦理赋予的正义力量,不畏一时的强权,逆转为最终的胜利者。非洲的原始状态好像是显影液,让浸入其中的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其真实面目。每一次的对话,每一次的接触都是一次揭露、还原的过程,土著的疾病、

死亡等地狱图景注定要发生在死亡制造者——白人殖民者身上。土著的患病、死亡与殖民者的衰弱、死亡是同一种力量造成的。土著之患病、死亡是具体的、肉体生命的,而殖民者的堕落和死亡则是本体意义上的、类属范畴的、灵魂的。非洲的土地、土著所代表的原始力量不会消失,而会以自己的方式迫使殖民空间产生崩裂,发生变形,最终的结果是来自自然的深刻的告诫:西方殖民征服表面的获胜难掩其内在的溃败,原始非洲在本质上获得了胜利。

#### 参考文献

- [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 [美]纳什. 大自然的权利[M]. 杨通进,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9.
- [3] [美]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4] [美]弗·卡普拉. 转折点[M]. 冯禹, 等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 [5] [英]约瑟夫·康拉德. 康拉德小说选[M]. 袁家骅, 智量, 等译, 赵启光, 编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6] 汪民安. 尼采与身体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7] 汪民安.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